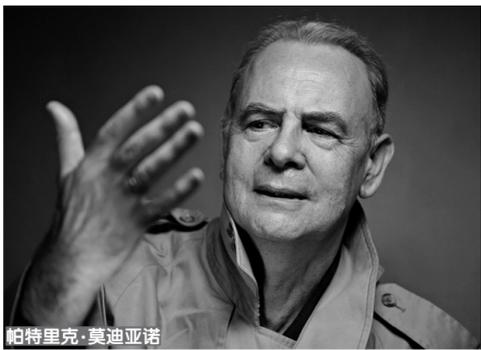


莫迪亚诺：记忆碎片的拾荒者

□张迎旋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10月9日，被誉为“当代普鲁斯特”的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成为第15位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颁奖词称他的作品是一门回忆的艺术，唤起了一段不可捉摸的人类命运的记忆，揭示了二战法国被占领期间的社会状况。他同时也是第一位先后获得龚古尔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评委会评价他的作品再现了二战中的巴黎城，将动荡岁月中普通人的命运进行了悲情演绎。他作品的结构总是以巴黎城的大街小巷为坐标，并试图在其间发掘关于回忆和身份的主题。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1945年7月30日生于法国。父亲阿尔贝尔·莫迪亚诺是意大利犹太人后裔，母亲路易莎·库碧金是比利时表演艺术家。他出生于二战胜利之年，他的作品与这场浩劫也有着不解之缘。他的父母和当时的法国作家莫里斯·萨克斯有过来往，这位亲德作家在1945年被德国人击毙。因为父母总不在身边，莫迪亚诺与比他年幼两岁的弟弟鲁迪亲密无间。不幸的是，年仅10岁的鲁迪在1957年因患白血病在一星期内夭折，这一噩耗为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童年画上了句号。出于对弟弟的深深眷恋，他1967年至1982年之间的早期作品，全都是献给弟弟的祭礼。同时，对于弟弟的回忆，使他养成了追忆往事、重拾旧梦的习惯。

少年时代的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因不堪忍受寄宿学校的军事化管理，成了逃逃的“惯犯”，因为居住环境卫生条件不好，他患上疥疮；1961年，父亲和一个比母亲小20岁的金发女郎有了外遇，父母离异；第二年，父亲再婚。幸运的是，从他15岁开始，母亲的朋友、著名作家雷蒙·格诺担负起了教育他的责任。由于生母穷困潦倒，他不得不忍受继母的冷漠，去和生父讨钱；从1963年开始，为了维持生计，他从私人收藏或图书馆偷书卖给书店老板，甚至伪造作者签名赚钱。1965年，为接济母亲，他再次去向父亲要钱，遭到了继母的

谩骂，父亲不仅不帮他说话，还叫警察来抓这个“小流氓”，父子一度断绝关系。同年，为了缓期服兵役，他注册了索邦大学文学系，但从不去上课，混迹于巴黎拉丁区的咖啡馆里，与吸毒颓废的嬉皮士为伍。1966年，生父和他取得联系，劝说他提前应征入伍，引起他的反感，两人互通的信件中不乏尖酸刻薄之词。

与雷蒙·格诺的交往对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来说至关重要，他被格诺引入文学殿堂，时常出席伽里玛出版社的酒会，1967年伽里玛出版社出版了莫迪亚诺的第一部小说《星形广场》，从此，莫迪亚诺开始专职写作生涯。

首部作品出版后，莫迪亚诺以Vogue杂志记者身份从事写作。1972年第三部小说《环城大道》获得了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莫迪亚诺以新寓言派实力作家的身份在文坛拥有了一席之地。

1973年，他与法国著名导演路易·马勒合作创作了电影剧本《拉孔布·吕西安》。影片描述一个法国青年在二战期间要参加法国抵抗组织的游击队，但由于言语不和而阴差阳错地加入了监狱神父的父亲的法奸组织保安队。该影片在1974年上映后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公众舆论认为男主角的人生轨迹不能得到辩护，是对英雄主义的亵渎。莫迪亚诺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但他并未因此消沉，1978年，小说《暗店街》为他赢得了龚古尔文学奖。

莫迪亚诺在40多年里创作了30多部小说，贯穿其间主题无非是“已故亡灵的永生”和“失而复得的希望”。出发点主要是两个主题：一是对自身和身边人们的身份的探求，二是对社会纷乱和动荡的不解。在他的作品里，作者或是叙述者总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为眼前每件发生的事情寻求意义，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将身份认证进行到底。莫迪亚诺甚至成为记忆的考古学家，珍视任何微不足道的资料，采集自身、亲朋好友和陌生人的信息并加以整理，以侦探和史家的笔法来剖析。此外，二战时法国被德国占领期间的社会状况也是他不断表现的主题，父母的人生经历启发他深入思考那一特殊时期的特别事件和特色人物，父母的意识形态的双重性也对他产生了影响。

同时，父亲和父爱也是莫迪亚诺小说的中心话题，许多附属的主题（缺席、背叛和继承等）都围绕这一中心话题而展开。这一话题也成为他半自传作品的背景，如《家谱》。在许多方面，生父对他而言就是一个谜，而写作让他自由发挥，在塑造父亲形象时添油加醋。他对父亲年轻时经历所知甚少，只知他从事走私交易；在二战期间，他父亲使用虚假身份生活，被捕后得到高层人物帮助获释。有人推测，他父亲是法国盖世太保组织的成员。从17岁开始，莫迪亚诺再也没见过生父，直到父亲去世，而且至今不知父亲埋葬在何处。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还为20多首歌曲作词，其中几首在法国家喻户晓，还有歌手以他作品中典型的巴黎广场咖啡

馆为创作题材，创作了名为《莫迪亚诺之吻》的歌曲。由此可见他的作品在法国的影响力。《星形广场》一出版，就获得了两个颁发给年轻作家的奖项：罗瑞·倪米尔奖和费内翁奖。该小说主人公拉法埃尔是个法国犹太青年，在二战开始后出生，对战争和酷刑有着狂热的癖好，他叙述自己的经历，亦真亦幻；作为仇视犹太人的法国盖世太保成员，他在日内瓦与法国贵族家族成员们以及作家莫里斯·萨克斯交往，与作为以色列企业大亨的父亲重逢；在读高等师范预科时，受到支持贝当政府的文学教授的影响，后来又逃亡到维也纳，最后去以色列劳改营接受再教育……但这一切离奇经历似乎只是主人公的杜撰，因为小说最后一幕是他坐在沙发上，接受貌似弗洛伊德的心理医生的治疗。

《暗店街》问世时，恰逢莫迪亚诺受法国总统密特朗之邀，与几位文坛领军人物共同出席一个电视访谈节目。密特朗十分赞赏这部作品，称该书的出版为文坛盛事。主人公居伊·罗兰是个侦探，15年前一次神秘的意外事件令他失忆。他于1965年孤身一人出发，开始了寻找自己真实身份的旅行。他追溯自己的记忆到二战时期，得知自己原名，并且知道自己曾是希腊裔犹太人，隐姓埋名潜伏在巴黎，为多米尼加共和国做事。他身边形形色色的朋友在1940年德国占领巴黎时纷纷逃离，他和女友企图逃到瑞士，帮他们偷渡的人将他们遗弃在山间……居伊·罗兰本想造访的一位关键人物也于他到访前遇难。最后惟一的线索就是他曾经有几个儿子，30年代住在罗马城犹太人聚居的暗店街2号……

2007年出版的《青春咖啡馆》也是一部具有影响力的作品。小说的几位叙述者分别是高等矿业学院的大学生、侦探、女主人公和她的恋人。离家出走的幽灵般的女人在巴黎游荡，留下了许多荒诞不经的回忆……作家居伊·德波评论这部作品：“在真实生活的半路上，我们被灰暗的忧伤所笼罩，《青春咖啡馆》这部作品中的许多尖酸刻薄的词语，恰恰贴切地表达了这种情绪。”

英国媒体并不看好莫迪亚诺的作品，认为他除了在英国有点名气之外，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什么影响力。也有人认为他过于自大，他的作品中的表达总是含糊不清，不够明朗，而且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总是会颁发给他这样喜欢介入政治运动的作家。10月初，69岁的莫迪亚诺刚刚出版了一部名为《以防你迷失在街区》的作品，随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曾有记者问他，为什么他的作品中充满了侦探小说的元素，但却从未写出真正意义上的侦探小说呢？莫迪亚诺回答，由于童年的经历，他对神秘失踪、身份探寻、失忆和回忆的主题很感兴趣，但他的小说不是侦探小说，不具有现实主义甚至自然主义风格，没有严谨的逻辑推理，没有说教目的，只是把记忆的碎片和残缺的梦境用想象的黏胶来粘合。他说：“深层的问题不在于回忆，而在于忘记！”

当代俄罗斯文学观察



也许是出于怀旧天性，也许是因为品尝了苏联解体后社会动荡的辛酸与苦涩，今天的俄罗斯和一些独联体国家逐渐出现了怀念苏联的现象，艺术和文学也流露出怀旧意味。近些年陆续上映的此类影片有《苏联时期的公园》、《回到苏联》，电视系列片有《苏联制造》、《月亮的背面》和《八十年代》，音乐作品有2005年的《生于苏联》及后来的《我们的祖国——苏联》和《多想回到苏联》等；文学创作也在经历了解体之初对前苏联的否定和控诉之后，逐步趋于冷静和客观。

当苏联这个名字连同它的辉煌给人带来的自豪感、幸福感、激情和信仰都在一夕之间远去的时候，苏联人遭受的心灵撞击不言而喻。随着岁月增长，怀念愈发真切。抒发这类情感的既有经历了两种社会的老一代作家，也有在苏联解体后才成长起来的年轻作家。他们笔下的怀旧具有广泛的社会内涵；既包括对前苏联体制和现实的反思，也包括对于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的怀念；既有对往昔细腻真实的再现，也不吝奇夸张变形的描绘手法；既可以整部作品都充满怀旧情绪，也可以使之作为象征而体现在某个人物身上。这些作品或是记录式的书写，或是荒诞不经的虚构，或有淡淡的感伤，或有辛辣的讽刺，勾起人们并不遥远的记忆。

21世纪初的一些作品往往在真实描写苏联社会的同时加入荒诞的成分。沃伊诺维奇的长篇小说《纪念像的宣传》描写了一个女共产党员与领袖纪念像之间的故事。主人公阿格拉娅对新大林极崇拜。她年轻时积极投身阶级斗争，1941年秋天德国入侵多尔戈夫，阿格拉娅接受任务要炸毁电站，但她的丈夫没来得及逃出。“祖国不会忘记你！”她从电话里向他喊完这句话就接通了导火线。1949年斯大林七十大寿时，她任区第一书记，倡议建造了斯大林塑像，将其立在市中心的斯大林广场。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闭幕。阿格拉娅听了赫鲁晓夫关于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报告，气得团团转。大家讨论拆除塑像，她简直无法忍受，给上大学的儿子写信，讲的全是自己关于这件事的想法。儿子追求物质生活享受，对母亲的激愤之情反应冷淡。斯大林塑像被拖走，准备熔化。阿格拉娅最后用四瓶酒换回塑像。为此，她被开除党籍，但她无怨无悔，与塑像共处一室。小说通过一尊斯大林塑像从诞生、竖立到转移、被炸毁的经历，反映了前苏联及俄罗斯40余年的社会和人民生活，提出“个人崇拜要不得”的主题，被评论界称为“带有怪诞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品”。

斯拉夫尼科娃的长篇小说《永生的人》（小说译文见《世界文学》2014年第3期）情节奇特：二战老兵阿列克谢·阿法纳西耶维奇瘫痪在床，为了延长其寿命，家人为他设定了一个让时间停滞的空间，清除所有代表时代变迁的物件和标志，把他熟悉的东西营造成永生不朽的样子：墙上挂着勃列日涅夫生前所拍的照片，电视里放着自己录制的节目和“晚间新闻”。“外部时间中的一切在内部时间里都失去了意义，内外之间的消息往来中断了。”老兵果真长久地活着，成了永生的人。

年轻女作家伊琳娜·博加特廖娃独辟蹊径，写作了怀旧小说《回到伊萨卡》。“伊萨卡”是古希腊爱琴海上的美丽岛国、神话英雄奥德赛的故乡。奥德赛历经艰险与诱惑，就是为了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因此，“伊萨卡”象征永恒的家的信念。小说中的小姑娘伊特卡每年夏天都和爸爸妈妈在一座小岛上度假，直到苏联解体那年。这座小岛同伊萨卡岛一样，成为伊特卡心中美丽永恒的象征，代表曾经的童年、国家，也代表曾经的岁月。奥德赛回到了故乡，可伊特卡却永远也回不到童年，回不到苏联，回不到过去。这种轻轻的叹惋贯穿整篇小说，恍如昨日，却如伊尔加河的流水一样远去。小说的中心情节发生在“八·一九”事件苏联剧变那夜，这使小说的意义不仅限于对童年生活的追忆，也是对一个时代的缅怀。爸爸希望伊特卡能够带着信念生活，就像他曾经的那样，但又隐隐感觉到这样的信念对于自己和女儿都有点不够。女儿生病了，他一心扑在女儿身上，竟把“八·一九”事件忽略了。清晨到来，女儿在一夜之间长大，国家也在一夜间解体。小说里充满了大自然的声音、色彩和气味，如交响乐般应和着情节的推动与进展，使记忆中的童年生活、国家生活都变得鲜活起来。小说景与情、梦幻与现实自然融合，像一篇优美的抒情散文，把童年的远去、光阴的流逝、国家的变迁几种意境结合在一起。

不再把前苏联简单地定性为好与坏、黑与白，而是理性审视它的经验与教训，这是当今俄语文学中对待苏联问题的新趋势。获得2014年俄罗斯“民族畅销书奖”的长篇小说《“自由”工厂》以其对前苏联生活真实具体的描写而深入人心。小说由一座军工厂里的工作人员及其子女对苏联时代的讲述构成，共45章，45个人的回忆构成了整个工厂的发展史，也折射出苏联社会的发展进程。每个章节都是独立的，但是在叙述上又层层深入，共同组成了一部多层次的作品，读来新鲜生动、引人入胜。小说家及文学评论家斯拉夫尼科娃在社科院外文所演讲时提到这部作品几欲落泪，因为她的父母曾在类似的军工研究所里工作，小说中工厂里的秘密生产、工人们对于自由的争取、城市人帮助农村等情节唤起她的回忆，她一再惊叹年轻作者对于细节的描写有如神助。作者布克萨今31岁，却有着罕见的文学天赋和经济学专业出身的清醒与灵透。小说建立在大量实际材料的基础上，经过了作家认真的检验与研究，其中对前苏联的态度没有嘲讽也没有颂扬，有的只是怀念和警示。

因《战争中女性》为我国读者所熟悉的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西西耶维奇于2013年发表新作《Second-hand时代》，也可译为《二手时代》。她坦言，早在上世纪80年代她就在构思一系列关于苏联及苏联人的作品。此前她已经出版系列的前5部，《战争中女性》（最后的见证者）《铤而走险》（巴译成中文）《切尔诺贝利的祈祷》《迷醉于死亡的人们》，《二手时代》是她与那个时代的告别之作。她先走访了几十座俄罗斯的城市，进行多达几百人的民间采访，然后把这些访谈内容原生态地记录下来。“我们还没有明白我们之前所住的那个世界，就已经生活在新的世界里了。整整一个文明瓦解了。”斯维特兰娜就是要让每个人都说话，让他们自己去回忆苏联，对比现在。她说苏联解体了，各种不同的思想作用在同一空间里，她想选择一些主要的倾向，把他们艺术地表达出来，让每个人都喊出自己的真相。

《二手时代》中的一个人物说：“社会主义结束了，而我们却留了下来。”是的，苏联虽已远去，而关于它的记忆、关于它的思索却成为文学作品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在不同的时代留下不同的诠释。

当代俄罗斯文学中的怀旧

□侯玮红

经典

阿斯特丽德·林格伦：

儿童的解放者与保护者

□刘秀娟

1944年，瑞典女作家阿斯特丽德·林格伦为女儿写下了《长袜子皮皮》，并心怀忐忑地寄给出版社，经历一次退稿之后，第二年得以出版。在给出版商的信中，她写道：“我寄给您的这部书稿，衷心希望您不要报告给儿童福利委员会。”因为凭直觉，林格伦自信这一定是“孩子们想听的故事”，但她自己也经常为皮皮出的言行所震惊。毕竟，在上世纪40年代的欧洲，儿童教育中的刻板、枯燥、压抑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不满，皮皮便是一个激进的叛逆者和挑战者。她让小镇上循规蹈矩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让实际生活中的教师和家长面临“危机”。经过一番争论，皮皮成为打破规矩、崇尚自由、充满活力、正义勇敢、富有想象力的“真正的儿童”。她的出现，被称为是“世纪儿童”的诞生。她和创造者林格伦几乎成了“解放儿童”的代言人和“自由人类的象征”。

无疑，《长袜子皮皮》是林格伦带来世界声誉的作品，也是至今为止独一无二的“林格伦式”的作品。作品鲜明的个人风格和开创性的意义正如其主人“皮皮露达·维多利亚·鲁尔加迪娅·克鲁斯蒙达·埃弗拉伊姆·长袜子”的着装和行为一样令人难忘。当然，这也遮掩了林格伦文学思想和风格令人吃惊的丰富性，而这种丰富性恰恰包蕴着林格伦对儿童精神世界的理解。重读林格伦，越发意识到她比我们原本以为的要复杂得多，背叛与传承、自由与使命、琐碎与史诗、热闹与孤独，那么多矛盾的双方交织在她的笔下，却又举重若轻，自然流淌在生动的儿童生活中，有思想的深度，却完全没有阅读的难度。

彻底的顽童与隐藏的成人

如果要推举最擅长刻画顽童的作家，当属林格伦，长袜子皮皮、小飞人卡尔松、淘气包埃米尔、疯丫头马迪根……这些顽童形象经常被视作“乖小孩”的对立面和成人世界的颠覆者。林格伦能真正破解了童年的秘密，准确回应儿童内心渴望。这些顽童身上包含了儿童最为渴望的自由、力量、冒险、游戏和安全感。这些形象，尤其是皮皮和卡尔松，实际上暗含了林格伦对待儿童的双重态度：一方面给予彻底的自由，另一方面又给予适时的保护。

对于孩子而言，自由的敌人就是“规矩”。在传统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中，基本上将“成长”等同于“守规矩”。看看“标准”小孩杜米和阿妮卡就明白了——杜米从来不用指甲，妈妈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阿妮卡遇到不顺心的事也从来不出声，她穿过的连衣裙总是平平整展。林格伦深知童年所要面对的“压迫”，无论是以爱的名义，还是以教

育的名义，“规矩”紧紧捆绑住儿童的手脚和心灵，使之僵化，限制自由和想象力，成为虚假而令人生厌的繁文缛节，对孩子而言，这一过程是天性的被压制和扭曲。热爱自由的林格伦质疑了这些看似文明、实则野蛮的规矩，反思了现代文明发展历程中偏离人的本性和生命内在活力的陈规陋习。“文明设下太多规则，我要全力去改写。”这是美国喜剧演员比尔·科斯基的自白，用来概括《长袜子皮皮》和《小飞人卡尔松》再合适不过了。

林格伦之前，似乎还没有哪位作家能如此具有突破性的给予儿童成长的自由：9岁的皮皮独自生活在一所大房子里，自己照料自己，拥有数不完的金币，可以倒着走路，可以穿着鞋子睡觉，可以把衣服湿透，可以捉弄警察，可以放开肚皮大吃，可以骑马上学，可以不会算术，甚至可以撒谎连篇……经常被大人呵斥的“不可以”，统统被皮皮推翻在地，她的特立独行颠覆了北欧小镇的生活。“难道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吗？”皮皮经常这样反问那些质疑的声音。陈规陋习、伪善、谎言和恃强凌弱在不同的时代变幻着不同的面孔，一直会充斥在生活中，束缚着成人以及孩子，时间久了，便成了“应当如此”，正因为如此，皮皮没有边界的奇思妙想和自由生活才如此具有冲击力。

如果说皮皮还仅仅是在自己的地盘上翻天覆地，象征的是富有想象力的、不受约束的、童年力量，稍后诞生的卡尔松就有些顽劣了：这个住在小弟弟屋顶上、可以飞起来的“胖叔叔”，懒惰、贪吃、蛮横、吹牛，他毫无愧疚地把小弟弟搞得状况百出。每当小弟弟担心妈妈会勃然大怒的时候，他总是说“她大可不必为这桩小事自寻烦恼”。这看似是无理狡辩，但何尝不是林格伦对成人的衷心劝慰呢：我们对孩子的爱，必须要包含对他的全部理解和接纳。卡尔松实际上象征着儿童好奇心、探索性、占有欲、缺乏控制和无力感的真实状态，是每个小孩在父母心目中都会有麻烦的一面。小弟弟对卡尔松的喜爱，其实是对内心深处被压抑的童年天性的认同。

孩子在林格伦的作品中获得的是“释放”，成人要学习的则是“理解”——理解生命内在生机勃勃的、健康向上的、自由无拘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显示出的不安分、破坏性与丰富性，只需给这天性以宽容和保护，它必然会显现出自身的光华。埃米尔便是这光华的显现，尽管整个地区的人们都认为他是“刺儿头”，但是他的妈妈坚信他能成为“伟大的人物”，最终，他成为一位有担当的男子汉。《淘气包埃米尔》是一幅充满世俗气息的农庄生活图景，它让人看到林格伦不仅长于幻想，在日常的生活中，她依旧能给

孩子创造出难以预料的生活喜剧，每个人，无论身份、性格、年龄，都在其中展现出滑稽可爱的面，而这喜剧的动力源正是埃米尔的一颗童心。

在顽童的面孔之下，皮皮和卡尔松身上有成人的影子。对身边的孩子而言，他们其实还是一个陪伴者、引领者，让孩子们尽情地享用童年。我甚至觉得，皮皮和卡尔松的使命或许不在于成为他们自己，而是一个“伙伴”，来解救并且陪伴、保护普通小孩被压抑的童年，帮助他们剥除身上的硬壳，展露纯真活泼的童真。皮皮的很多游戏、谎言其实是为了让杜米和阿妮卡快乐。她所费的心思，一方面让孩子们玩的时候放松、没有负担；另一方面，又要洞察大人的底线在哪里，安抚他们的担忧。而卡尔松的胡闹，不过是为了“找点乐子”，其实正是小弟弟渴望又不敢去逾越的。在故事最后，皮皮和卡尔松实际上都与成人达成了和解，是童心的力量、蓬勃的生命之美说服了成人，也是大人们意识到在护佑孩子这一面，他们与皮皮、卡尔松是一致的。

“如果我们不那么渺小和孤单”

虽然知名度不如《长袜子皮皮》和《小飞人卡尔松》，但如果忽略了《米欧，我的米欧》，无论如何都不是完整的林格伦。在这部作品中，林格伦显示出她是一个现代童话的创造者，同时又极为熟悉民间童话的要素；她善于营造欢乐、敏锐地体察孩子内心的孤独，同时笔墨沉郁、诗意、耐人回味。

《米欧，我的米欧》创作于1954年，是一部以儿童的孤独和成长为主题的寓言式作品。男孩布赛是弃儿，在养父母家过着冷漠压抑的生活。然而他真实的身份是遥远之国负有千年使命的王子米欧，9岁时，使者将他接回遥远之国。他发现，伊甸园般的遥远之国深陷恐惧，只有自己能除掉骑士卡托，米欧和伙伴丘姆-丘姆踏上除暴之路……林格伦的大部分作品是线性的故事发展，结构单纯，轻松幽默；而《米欧，我的米欧》则含蓄内敛，是她作品中少见的圆形的、多层次的叙事。它发生于现代生活，又接通古老的童话传说，从空间到时间，从结构到意象，从主题到细节，都形成了多层次解读的可能性。

似乎从未有人提及这部作品与《哈利·波特》有相似之处，但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是如此明显：孤儿-王子、传说-使命，它们的核心结构是相通的。即不能说J.K.罗琳从《米欧，我的米欧》受到启发，起码也是相



阿斯特丽德·林格伦

近文化催生了相似的灵感。

和《哈利·波特》手法极为不同，《米欧，我的米欧》是一部诗象征的童话。它将民间童话和欧洲史诗元素融合在一部表现儿童成长孤独的现代童话中，在回环往复中将米欧推向他的必然的使命。为完成这个使命，作家以反复的结构营造主人公的困境，每处困境又最终会出现奇迹，每当陷入困境，两个男孩会以相同的句式诗意地、象征地表达他们的感受。

“如果我们不是那么渺小和孤单就好了。”在艰难跋涉的途中，丘姆-丘姆经常会流露出这样的无助感，这也是解读这部童话的一句密语。所以说林格伦是真正懂得孩子的作家，就在于她还深刻体察到童年内在的忧伤和孤独。孤儿以及在家中受到漠视的孩子会更加强烈地体验到这种孤独感，他们不得不独自长大，以孩童的渺小和孤单面对不可知的未来。林格伦细腻地反复呈现两个男孩的弱小、孤独和恐惧，将艰巨的使命与儿童的羸弱形成强烈对照，凸显成长的必然与宿命。

在《长袜子皮皮》《小飞人卡尔松》《淘气包埃米尔》和《狮子兄弟》等作品中，也会流露出孤独感和委屈，比如皮皮经常替自己解围的话：“一个小孩子，她的妈妈是天使，爸爸是黑人国王，而她自己则漂洋在大海上，你怎么要求她总是讲真话呢？”连杜米和阿妮卡也偶尔能感觉到皮皮的孤独：“冬天树叶都掉光了，他们可以一直看到皮皮的厨房里，皮皮双手抱着头坐在饭桌旁边，她的眼睛带着做梦一样的表情盯着面前一支火焰不断跳动的蜡烛。”“她……看上去孤零零的，”阿妮卡说话的声音都颤抖了。“噢，杜米，这会儿要是早晨的话，我们立即就去她那里。”“父母不详的卡尔松也会假装生病，要求小弟弟像自己的母亲那样照顾他。这是林格伦对深陷孤独的孩子理解与安慰。

在林格伦和她的作品面前，大多言说都会显得苍白、笨拙，你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穷尽作品的妙处，既无法抵达作品的深度，又要提防把简单的事情说复杂了，要去剖开这简洁里的丰富，会觉得那么饶舌——我简直能够听见皮皮不屑的嗤笑：瞧，这些无药可救的成年人！